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1889—1920)  
——戴乐尔回忆录

W. F. Tyler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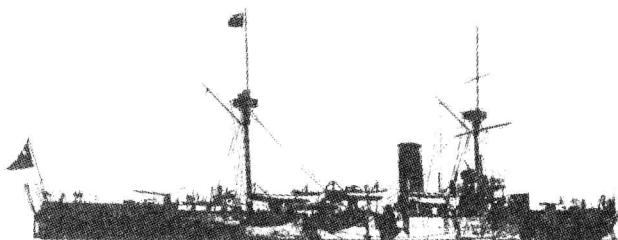
[英] 戴乐尔/著 (William Ferdinand Tyler) 张黎源 吉辰/译

文匯出版社

#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1889—1920)

——戴乐尔回忆录



[英] 戴乐尔/著 (William Ferdinand Tyler) 张黎源 吉辰/译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戴乐尔回忆录：1889～1920  
／（英）戴乐尔著；张黎源，吉辰译。—上海：文汇出  
版社，2011.5  
ISBN 978-7-5496-0214-8

I. ①我… II. ①戴… ②张… ③吉… III. ①戴乐尔，  
T.W. (1889～1920) —回忆录 IV. ①K835.6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4872号

###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戴乐尔回忆录（1889—1920）

策 划 / 陈 悅  
出版统筹 / 么志龙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王三三  
封面设计 / 翁 涌  
制 版 / 九章文化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版 次 / 2011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250千字 60幅图  
印 张 / 18.5  
书 号 / ISBN 978-7-5496-0214-8  
定 价 / 35.00元

# 序

经常有人问我，何时起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也经常会讲述一段中学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将近 20 年前的靖江县中学，历史课上到了《甲午战争》一课，当天历史老师因故缺席，由一位别科的老师代课。中学的历史教育，基本属于照本宣科。特别的是，在讲完书本上这课的全部内容后，代课老师说起了老电影《甲午风云》。在那时，同学们对于甲午战争的直观印象，无疑都来自于这部电影。不过这位老师说得不同寻常，大意是说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依据自当时北洋海军里一位外国人事后作的回忆录，而这类回忆录所述真实与否，其价值需要通过研究才能判断，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将来不妨寻找原文自己分析云云。

说者可能无意，听者有心。这一席话，让我记住了有本北洋海军洋员写的回忆录。同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对史料的追寻，产生了懵懵懂懂的最初印象。

这本回忆录，就是戴乐尔所著的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直译《在中国牵线》）。

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 出生于英国，青年时作为后备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华，后转入赫德主持下的中国海关，长期在缉私舰船上服务。1894 年受雇进入北洋舰队，亲历了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等重大事件。北洋舰队覆灭后，戴乐尔重回海关任职，此后一直为中国服务到 1920 年才最终回国，期间又经历了诸如辛亥革命、孙中山二次革命、中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等等重大事件。1928 年，戴乐尔在故乡默默去世，生前所作记录在华经历的 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一书于 1929 年正式出版。

几乎是第一时刻，这本书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青年学者张荫麟留学美国期间读到了该书，对书中记述的甲午往事发生浓厚兴趣。



1931年，张荫麟将书中涉及甲午战争的部分进行节译，刊载于国内出版的《东方杂志》，正式介绍进中国。归国后，张荫麟又以戴乐尔回忆录为主要参考材料写成学术论文《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1935年初在《清华学报》发表。该文是目前所知的甲午战后中国第一篇关于这段历史的学术论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颇大关注。

晚清创建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现代化海军的渊源之初，其兴衰成败在近代史研究上处于热点位置。但自北洋海军甲午之战覆师后，几乎所有幸存的中方人员都对这支舰队过往的故事三缄其口，惟有的一点点回忆性史料多来自于当时担任顾问、教习等职务的外籍人员。然而这些史料又多是单篇的文章，不仅数量少，篇幅也较短。因而，借着张荫麟的介绍，在北洋海军中曾任重要职务的戴乐尔回忆录，立即在国内学术圈中声名洋溢。

1957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出版，张荫麟节译的戴乐尔回忆录被冠以“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篇名列入其中。《中日战争》丛刊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汇编。由这套书传播，张荫麟节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甲午战争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影响甚至直达于电影银幕。不过囿于种种原因，涵盖了三十年中国往事的戴乐尔回忆录，在国内学术界始终只是被关注其中涉及甲午战争的一段。而学界又多使用张荫麟的节译本，原书则鲜有人注意。

2006年，海外著名海军史学者马幼垣先生不惮劳烦，将戴乐尔回忆录原版全书分三次陆续复印，从万里之遥的夏威夷寄来威海，使我得以首次一窥戴氏回忆的原貌，终于圆了年少时的梦想。

从夏威夷大学荣休的马幼垣教授，治中国海军史以善将中西史料融会贯通、对比印证而著称。马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翻译的时代局限和译者当时的功力问题，张荫麟节译的戴乐尔回忆录存在有误译、漏译等诸多问题。

当时正在孜孜以求考证中日黄海大海战战场细节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张黎源先生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迹象，勇于担起重译戴乐尔回忆录中甲午部分的重任。2009年，北洋海军成军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召开。会议间隙，我与张黎源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吉辰先生再度聊起戴乐尔回忆录，提议不以

张荫麟当年所译的范围为满足，而将戴乐尔回忆录全书译出。此后两位译者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2010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此时距离张荫麟节译版的传世已近80年。

翻译过程中，张黎源、吉辰先生展现出了严谨的学术风格和扎实的西文功底。戴乐尔本人缺乏良好的初级教育，所写的文字语法较为混乱，很多段落文意模糊。他们往往为核对一句话的含义而费劲思量，反复讨论，对戴乐尔回忆录中涉及的大量专业名词、人名、地名等，均做了仔细的考校、确认。为使该书更易阅读，两位译者还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贡献良多。《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无论在内容完整性还是学术性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张荫麟的前译。

《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出版，使得这本不易得的著作有了一次在作者第二祖国普及的机会。因为是完整版全译，这本书将不局限于甲午战争时代的故事。戴乐尔亲身经历的其他重大史事，都历历可见地呈现到了今天的国人面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位英国人的眼睛，去观察那个时代中国方方面面。

同时，对于学术界而言，《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一桩史料整理的新成果。可以预期，这本书的面世，将会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一股推动力，并给近代史学者提供若干参考。

再次感谢张黎源、吉辰先生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文汇出版社慧眼识英，让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谨借此纪念那位北洋海军的洋员戴乐尔。

陈 悅

2010年11月14日于山东威海

# 原 序

在上海，我的那座面向跑马场的小房子里，我的朋友巴斯<sup>[1]</sup>正在和我讨论。几年前，我俩还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一艘税务巡船上的下级军官；现在我们在商讨，在皇太后得到奏请，填补海军总司令一职空缺的情况下，三位总督如何对海军进行控制。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俩嘲笑了一通时局。“咱俩退休以后，”巴斯说道，“你可得写一部你我两人的回忆录，咱们叫它什么好？”关于书名，他采纳了我所提议的《在中国牵线》。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但是，日后的巴斯和我分道扬镳了，后来去世。因此，原先的计划就无法整体实现了。作为代替，我写下了自己的经历，并且在其中安排了巴斯的位置。不过，我出于怀旧的情感保留了原来的书名，尽管这一书名已不太合适，哪怕是在加上巴斯的故事之后。

对于 H·B·马士（Morse）博士和约翰·普瑞特（John Pratt）爵士对史实方面引文的审阅，我深表感谢，但这并不表示两位先生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与立场。我还要感谢 J·沃特曼（Woltman）先生、L·A·莱尔（Lyall）先生与 S·F·迈耶斯（Mayers）先生所给予的鼓励与建议。

波琉璃梅尔（Beaulieu-Sur-Mer）<sup>[2]</sup>,

1929 年 3 月

---

[1] 路德维希·巴斯（Ludwig Basse, ? ~1913），德国人，1885 年随“镇远”舰来华，曾与戴乐尔在海关巡船上共事，私交甚笃。清末海军重建时派充总察海军全军轮机及稽查江南船坞事宜。

[2] 法国南部海滨城市。

# 目 录

**序 / 1**

**原序 / 1**

**第一章 早年经历 / 1**

1. 学业 / 1
2. 航海岁月 / 4
3. 我的杀人犯朋友 / 11

**第二章 战舰 / 17**

1. 海军训练 / 17
2. 中国税务巡船 / 26
3. 中国海军 / 31

**第三章 大东沟海战 / 39**

1. 战况 / 39
2. 战后 / 48

**第四章 威海卫之围 / 54**

1. 开始 / 54
2. 攻击 / 60
3. 投降 / 73

**第五章 幕间 / 85**

1. 探亲假 / 85
2. 有关恐惧 / 91
3. 沿岸工作 / 96

**第六章 中国海关 / 103**

1. 诞生 / 103
2. 船钞部 / 111
3. 巡工司的工作 / 119



**第七章 长江之龙 / 132**

**第八章 义和拳之乱 / 145**

1. 义和拳时代 / 145
2. 巴斯变了 / 150

**第九章 黄河 / 158**

**第十章 中国海军部 / 163**

1. 日俄战争 / 163
2. 海军商务处 / 169

**第十一章 工作的间歇 / 176**

1. 羽毛的故事 / 176
2. 海盗 / 182
3. 传教士 / 188

**第十二章 中国政治 / 196**

1. 王朝革命 / 196
2. 袁世凯 / 201
3. 二次革命 / 207

**第十三章 上海 / 215**

**第十四章 世界大战 / 229**

1. 中立工作 / 229
2. 中国参战 / 232

**第十五章 顾问工作 / 237**

1. 水利委员会 / 237
2. 北京的工作 / 242
3. 中国政治 / 249
4. 巴塞罗那会议 / 252

**附录 / 256**

**译后记 / 279**

# 第一章

# 早年经历

## 1. 学业

我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的教区牧师，祖父——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专员——留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家产。不过，家里有九口人要养活，因此他做投机买卖来增加收入，但却大赔了一笔。因此，他仅仅能供得起我的长兄上公学，而我就待在家里，由他自己来教。从 1876 年开始，我在学习方面遭了大罪——拉丁语、希腊语、犹太语——主要学的是这些，因为这是我父亲所学的东西。另外，还要学欧氏几何和逻辑学。父亲还努力学习代数，以便用来教我——对于我俩来说，这都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当这些学习成为我的生活固有内容之后，它的徒劳无益就集中体现了出来。学习，让我年轻的神经变得迟钝了；学习，就像不停抓挠伤口一样令人痛苦。我对圣徒一样的父亲的挚爱和对他耐心教导我的感激，让这一切变得更糟了。在一次声泪俱下的骤然反抗之后，这一切总算结束了。我抽抽噎噎地说，这些古典的玩意儿对一个永远不可能进大学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同时，我还求他让我进专为农民和店员子弟开设的文法学校读书。但是，父亲对此摇了摇头。在我爆发之后，父亲对此绝口不提，而课程则被停止了，除了犹太语和逻辑学。在很大程度上，这两门课程以及相关的问题被当作一种互动的游戏，而非单方面的教授。

回想起来，我那贫穷的父亲绝望地放弃了教学，是因为他能教的我学不会，而其他的课程他又无法教我。在我心中，总是萦绕着对自己身上将发生什么的担忧，但是我听过的课程没有一门提到过这个。我努力尝试自学——从黎明到早饭



前，在我的阁楼房间里偷偷学。当然，我的学习没什么系统，而且，我父亲的藏书室对此来说几乎没有用。只有几本那时的书我还能记得起来：《英国的真菌》、《肠道寄生虫》，它大大地激起了我的兴趣；还有《佩利的证词》，这本书我实在读不动。

但是在十五岁那年，我从这种痛苦的焦虑情绪中解脱了出来。我的堂姐玛丽·戴乐尔——愿上帝为她的慷慨而赐福——凑了钱供我上学。我被决定培养成一名海军轮机师，于是我和打算从军的兄弟一样，准备被送进一所军事补习学校，尽管我学得很慢。在那时，我的学术知识几乎完全局限于欧氏几何，但我的优势在于，我那未经开发的头脑正准备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我有着最热诚的学习热情。

我们兄弟进入的这所极好的学校，是一位有名的补习学校的教师创办的。学校大约能容纳一打小伙子，而他们大多因为惹事生非被开除，剩下的只有我们兄弟和其他三个人。一句话，既然这里有最好的教学条件，怎样利用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那位教师和他的家人住在两座彼此相通的大型半独立屋<sup>[1]</sup>中的其中一座。他在心理学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相信，他的小伙子们应该做做游戏。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滥用给予他们的完全的自由，以致把他的学校变成一处妨害公众的地方，毁掉他的事业。但是，这恰恰是他们所做的。

他们的恶作剧是以军事方式进行的——所有一切都可以用军事术语来形容——而且，他们的战术与战略还挫败了警察为控告他们而对房子进行的突击行动。他们把邮筒装上炸药，制造了大爆炸；他们用一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缴获的大炮发射砾石，部分破坏了市里一名富翁的大暖房；他们掘了一条从花园通向邻居房子的地道，被后来的房客所发现。这些算是“对外”活动。而当教师拒绝提供煤来为卧室生火取暖时，“对内”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他们弄来了一把锯子，把可以闲置的家具当成了燃料——开始是椅子和杉木桌，最后连木质的壁炉台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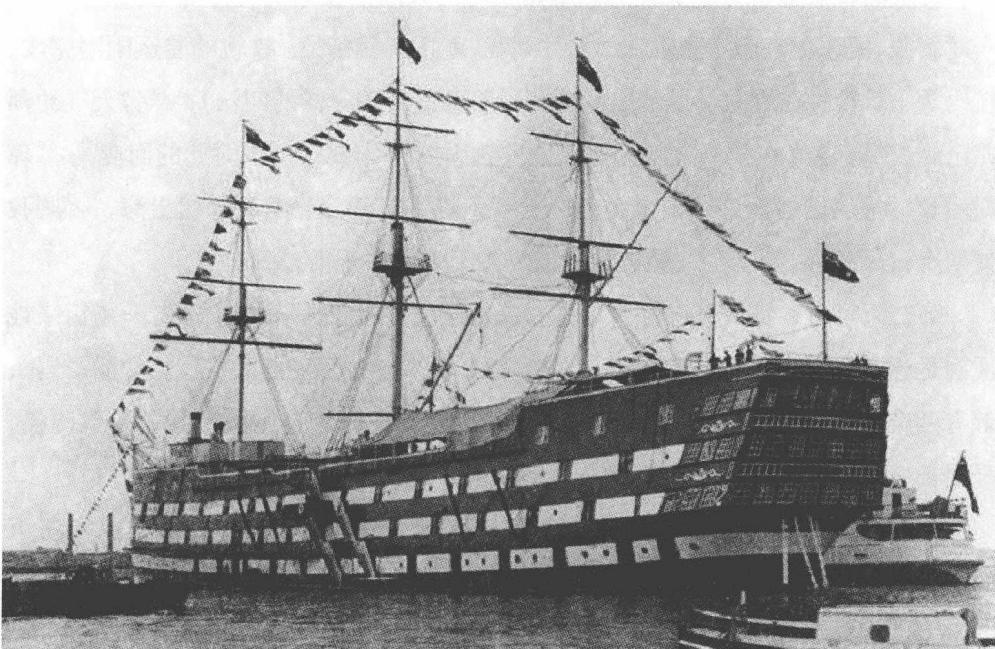
[1] 指两座房子左右毗邻，共用一面墙而有各自的门户，这种住所在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较为流行。

锯开烧掉了。然后，仅仅是出于破坏心理，他们举行了一场在隔板墙上钻洞的比赛，比谁的速度快。

诸如此类的事情一直持续了两个或三个学期。据说地方治安官在推动关闭学校一事上出了力，而这是并不需要的，学校已经崩溃到无法维持的境地了。

这个地方是很棒的。如果说这里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的个人需求，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实如此。这里有一群第一流教师所提供的个别指导，他们对于我这个求知欲旺盛的特例很感兴趣，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在学校里几乎不可能有的开端。

我接下来的求学经历如下：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待了一年；在海军体检中被刷掉，原因是医生说我得了甲状腺囊肿，而这是误诊；在练习舰“伍斯特”（Worcester）号上度过了两年。很明显，这样的学习过程是相当散乱的，但是我在学校里是数学和物理课的尖子，在“伍斯特”号上拿了一堆奖，而且得到了海军后备队<sup>[1]</sup>候



戴乐尔曾见习过的练习舰“伍斯特”

[1] 即皇家海军后备队（Royal Naval Reserve），英国海军的后备力量，创建于 1859 年。



补生的身份。

我并不期待海上生活。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道路，是因为这是最快让我独立的办法。一旦登上第一艘海船，我就不再是受家人照顾的孩子了。

## 2. 航海岁月

1884年，年方十九，身强力壮的我在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登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艘船，成为船上的四个见习水手之一。它是一艘八百吨的利物浦籍三桅帆船，运铁轨去一个澳大利亚港口。船主是一家取了个犹太名字的公司，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选中我的原因。前一天晚上，我在伦敦参加了一场舞会，在那里待到最后一刻。我穿着燕尾服回来，在旅馆里换上工作服，然后来到码头。

场景的转换显得有点儿突然。喝得半醉的大副正在擦洗一台抽水机。他长了一对斜眼，眼屎糊在脸上很显眼。一见到我，就招呼我帮忙。铁轨的装运刚刚完成。在码头上，船长在竭力劝说着船老公<sup>[1]</sup>（船务监督那时候的叫法），恶劣天气的预兆已经显露，这样在早潮之前无法保证铁轨固撑<sup>[2]</sup>牢靠。后者对此的回应是：“琼斯船长，拖船已经雇好了，水手们今天下午也签了约。你给我开船出海，否则我就换个肯干的人。”于是，船长转身催码头工人赶快干活。

第二天早上，坏天气已经开始了。暴风信号<sup>[3]</sup>上下翻飞，预示着一场后来被证明是这一带海岸最严重和最具灾难性的飓风。拖船已经挂上了我们的船。码头上有两个港口官员正在议论着我们愚蠢的出航。而船老公则脸上挂着一丝冷笑，祝船长一路平安。

风往西吹，越吹越猛，海面随之颠簸不定。而直到天黑——天空是阴沉沉的——海况才容许起帆。中桅下帆和船首三角帆被扬了起来，随后，沉重的拖缆

---

[1] 原文为“Ship’s-husband”，指受船主委托，负责船只在某一港口的出入港手续、供应、修理等事务的代理人。

[2] 航海术语，用板材撑紧舱内的货物，使其不会散乱。

[3] 警告暴风到来的标志，俗称风球。

也开始回收。由于某种原因，或者是因为夜色和海浪吧，拖船松开了缆绳，而没有收回。船长跑到船头，观察这一麻烦的事故。他很快转了回来，头一次和我说了话：“你是个练习舰上的见习生，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大副喝醉了，二副会做的就是起帆和打扫，我自己得看着缆绳。你待在尾楼甲板上给我盯着，保证舵手让船抢风行驶，别让它停下来，而且，看在上帝分上，别让它逆着风。”于是他把我留在那里，过了四个钟头或者更久才回来。

一开始，承担这意料之外的责任而产生的自豪感压倒了其他感觉。不过好景不长，我晕了好一阵船，吐得一身恶臭。我听说，喝海水可以治晕船，于是试了试。我从排水口那里掬了一捧水喝了，结果难受得简直想死掉。不过我的值更任务因此也停止了，这剂猛药也算是起到了它的作用。

由于风疾浪高，我们在挂横顶帆航行时向右舷偏航了。然后，我们所担心的灾难发生了：铁轨挣脱束缚，散架了。接下来的一幕简直是地狱里的景象，大条大条沾满油污的铁轨到处滚来滚去，弄得上层甲板前后左右颤动不已。于是，除了舵手之外，大副二副和全体水手都跑去处理了。四个小时以后，我被派下舱去问他们干得怎样了。铁轨翻滚相撞的巨响不绝于耳；油漆涂料令人作呕的气味让舱内污浊的空气愈发难闻；白铁罐做的粗劣油灯摇曳不定，使环境显得更暗。要想把这些巨大的铁条捆扎或者固撑起来，纯粹是白费力气。它们纵横交错，弄得场面一团糟。这场徒劳而危险的搏斗又持续了一个小时，终于被放弃了。然后，我们迎风扬帆行驶。在距离利物浦几小时的地方——那时正值黄昏——我们用传声筒和一艘拖船搭上了话：“你们拖我们要多少钱？”——“这么多。”——“不，那是不可能的。”——“出这么多的话我们就肯干。”——“办不到，我们最多出这么多。”——“再见，祝好运。”

接下来，我记得我端着一盏油灯站在甲板上，以便让船长看清利物浦水道的海图。他带着担忧与疑惑的语气，问我能不能一起商量。于是，我又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八点钟涨潮，我们不能错过它。我们必须赶上，要不就完了。涨潮的时间离我们似乎太近了，这样的话我们会进不了港的。你怎么看，孩子？”——“我觉得应该冒险一试。”——“唔，我不会的。如果我这么做，这条船或许会损失在我手里。我宁愿冒违背天意的险。”他下了命令：“拽右舷的转帆索。”于



是我们改变左舷抢风行驶的状态，航向向北，试图回巴罗因弗内斯。北行一阵以后，天破晓了，我们看到了另一艘拖船。这次没有讨价还价——大概是处境使然。风暴减弱了一点，我们顶风停船，泼油来制造一片平静的海面。<sup>[1]</sup>然后，一名引水员坐一艘短艇换乘了过来。在海上，这样比坐船载小艇要安全。随后，这种安全又被打破了。拖船在给我们抛缆的时候，一个浪头把它推向我们的船头，结果船首斜桅把它的烟囱撞坏了。这下，拖船也自身难保了，于是一瘸一拐地驶向海岸。我们把前桅下帆桁往回拽，重新左舷抢风行驶。但是，福姆比岬（Fromby Point）和南港（Southport）之间的海岸是在我们的背风处，而且引水员上船造成的耽搁也让我们偏航得太远了，迎风行驶已经不可能。因此，我们下了双锚并且松开了索端<sup>[2]</sup>。

前一天，厨房的门就被海浪打坏了，里面的东西也被卷走了。因此雪上加霜的是，现在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淡水了。甲板上空无一人。和住在后舱的船长一起的，还有大副、二副、木匠、缝帆工和引水员；在我们的舱室，船上最无遮蔽和结构最脆弱的地方，是我们四个见习水手；在船首楼里的，则是水手们。引水员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他的看法：我们已经没什么机会了，我们身在最糟糕的地方，“魔鬼的洞穴”，处于背风的危险境地，没有船可以逃过这一劫的。海浪不会这么起伏一下就算了，它会带来凶猛的冲击和浪峰浪谷，那会淹过我们的船头和舷墙，从舱面的一头灌到另一头。

那个小舱室里的四个人之中，有两个在他们的铺位上睡觉。诺曼·韦特（Norman Waitt）和我——我们曾经一起在“伍斯特”号上当见习生——则吝啬地瞒着他们俩，慢吞吞地享用着最后一只橘子。我们很口渴，因为这一两天吃的净是船上的饼干和咸鲱鱼。不过韦特的口渴还稍微好点，因为他把他母亲给他的箱子里的药水混起来喝了下去。它们的药效一定是互相抵消掉了，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反应。

[1] 这种方法是利用油的较小密度和较大表面张力，在海面上形成一层油膜，保证海面暂时的平静以便作业，航海术语称为“镇浪油”。

[2] 注意航海术语“索端”（bitter end）的普遍含义：末端，拴在缆桩上的那一头——原注。“索端”一词在海员行话里有“痛苦的结局”之意。

我不记得感到过害怕，或许是寒冷、阴湿——有一面舷窗被撞破了——和极度口渴的折磨让我无暇多想。痛苦让我们把手放在我朋友的《圣经》上发誓，再也不出海了<sup>[1]</sup>。就在那时，在海浪咆哮和残片撞击的响声之间，传来了锚缆断裂的声音。我们没听到第二根锚缆的断裂，是大副在首楼上尖厉的喊声让我们知道的：“到船尾来，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十分钟之内我们都得去见上帝！”我们在挨揍之前跑到了船尾，这时船已经随波逐流了，而且船里进了一点水。然后，我们在沙洲上搁浅了。浪头把我们抬高放低，就像是我们自己跳高十英尺左右一样。

我们现在都在饭堂里。大伙儿嚷嚷着要喝酒，但是没法弄到。斜眼的大副以渎神的口吻发誓，如果这次得救的话，一定要过更好的生活。船长挂念着他已指挥过多年的船，念叨着：“可怜的老姑娘！可怜的老姑娘！”船每次发生撞击，那个引水员就给我们“打气”，说这些流沙已经葬送过太多船只了。

不过天佑或者说好运终于降临到了我们头上。涨潮开始后，我们被托离了流沙的脊。到了黎明，我们出乎预料地发现自己有救了。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海湾里有些小黑点，或许那是一打失事海船的残骸。有记载说，沉没的船只枕藉相望，其上的人员损失也很严重。这是一场很著名的风暴，1884年大风暴。

当风暴平息后，我们坐一艘救生艇上了岸。到了晚上，我们徒步走到了几里路之外的南港。我们知道，第二天早上涨潮时，我们的船会被抬高。于是我们雇了一辆双马拖曳的货运马车，在拂晓时赶到了那里，以便赶在打捞人员到达之前追回我们的损失。有个说话客气、穿着体面的男人说可以替我们找个住处，结果他把我们领到了一家妓院。我们一时被这里惊呆了，一回过神来，我们便逃离了那个危险而令人厌恶的地方。在日记里，我发现了这段记载：“我们被带进了一家饭馆，但是没发现我们想要的，就离开了。”——这真是一段轻描淡写的奇文，一段斯斯文文的记录，很明显，它出自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青年之手。然后，尽管我们衣冠不整——穿戴的是套头毛衣、工装裤和高筒橡皮靴，没有大衣和帽子——我们还是大胆地在晚餐时分走进了皇家旅馆，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

[1] 韦特在我之前就打破了这个誓言，后来在沉船事故中遇难。——原注。



我想，就是那个誓言（我有一段时间对它非常认真）和对死的恐惧（那群海员在祷告和指天骂地时经常流露出这种情感）让我选择成为一名海军牧师。一般来说，我是个相当虔诚的年轻人，而遇险的经历给了我思考的契机。但是，由于一个很不寻常的原因，这一决定并没有实施。我想知道，此前和此后是否有过这种事情，如此庄严郑重的决定被如此荒唐可笑的原因所挫败。这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为了海军牧师的职位，我去拜访一位有名望的教师，他的名字是小约翰。我碰巧知道他的住处在格林威治，所以我对地址和名字都没怎么在意。他的名字真是很好记，尽管我很不擅长记人的名字。拉响了门铃之后，我随即突然意识到那个简单的名字已经在我脑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家主人在吗？”这种口吻就像是屠夫的孩子一样，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这时门开了，走出来一位漂亮的女仆。我犹豫了片刻，忽然灵光一闪。“斯莫考克先生在吗？”我傻乎乎地问道。起初她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她轻蔑地撵我走，并且砰地关上了门。结果，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感到万分沮丧。回到家后我告诉父亲，我改变了主意，打算再次出海。

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问题——如果我没犯那个错——我也许已经当上主教了。

我无意讲述关于在一艘海船上度过的那三年的故事。时光漫长而无聊，但有时要在大风中费力地降帆，身上又湿又冷。与粗线条的船上生活反差明显的，是在悉尼和惠灵顿的经历，我在那里社交、下馆子、跳舞、野餐，去了总督府，还迷上了一位主教的女儿。早期的旧金山是充满野趣的——“你得让脖子刮干净，否则我割了你的喉咙。”当我拒绝理当地的流行发式时，理发师这么对我说。在那些漫长的航程中，我和伙伴们混得很熟——从旧金山到英格兰的六个月里，一块陆地也没瞧见。有个酗酒的船长以为我是船主的侄子，他要是发酒疯的话，就让我读《圣经》给他听。有个蠢笨的学徒很受船长讨厌，“孩子，你的意思是让风弱下来吗？吹口哨，你他妈的，一直吹到它停下来为止。”于是，萨姆吹了几个钟头，直到他的嘴唇麻痹。还有一次他清醒着，那时船体晃动剧烈。“孩子，